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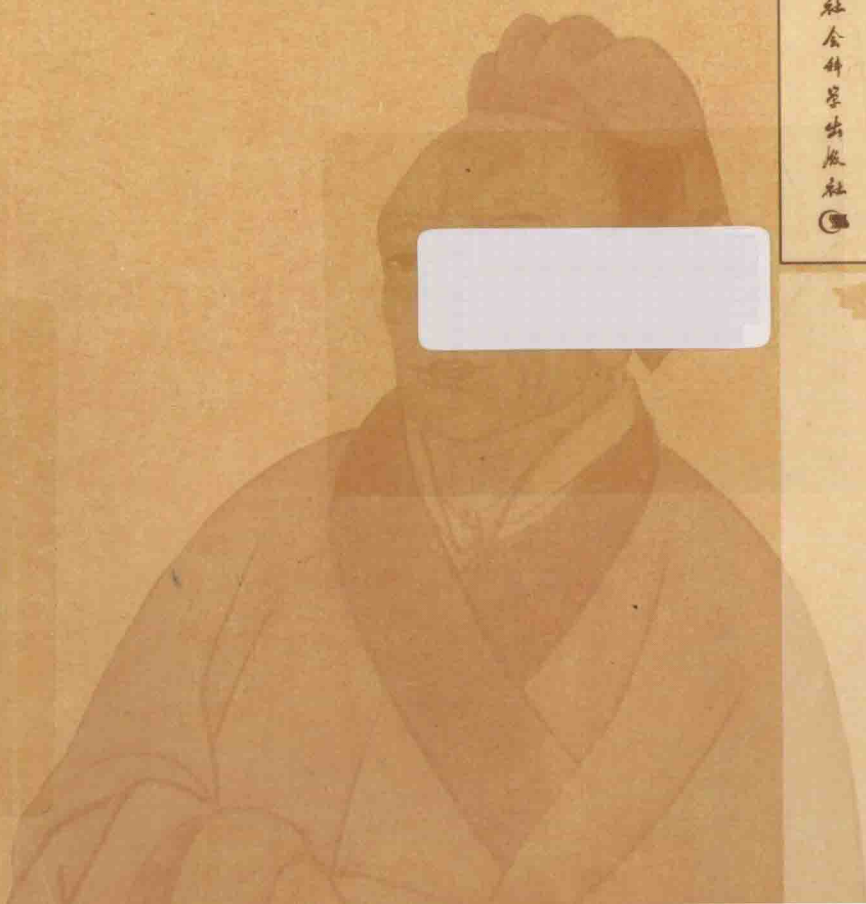
司馬遷為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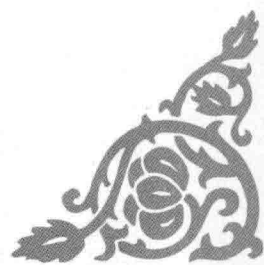


施丁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司馬遷為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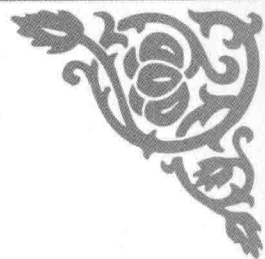




司马迁为人学

施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司马迁为人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为人学 / 施丁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557 - 0

I. ①司… II. ①施… III. ①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人生哲学—研究 IV. ①K825. 81②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23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司马迁的“为人”学，是他的自立与“三立”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他史学中优异的思想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是应当揭示和强调的。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丰富的史学，很注意人的行为，观察其做人怎样，很讲究为人（即做人）之道。司马迁在写上古至当代（汉代）三千年的历史中，有五六十处明确地提到历史人物的“为人”。为人之道，是他对待古今历史人物首要的注意点。对于历史事件也首先关注有关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早在先秦时期（即两千年前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提出了自立和三立问题。《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讲究人的自立和益世，也即为人处世之道。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才谈得上三立。《左传》提到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就是自立的三个方面，也就是为人之道的体现。

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其中司马迁的《史记》，以传人为主，以为人、为政、为学的“三为”为要。所谓为人，即为人处世，其人正斜、善恶、直曲、诚诈、冷暖等如何。所谓为政，即做官当政，其人掌政之使用权公私、廉贪、待民利害、忠奸等如何。所谓为学，即治学品行和致用。其人治学虚实、学用、言行、表里等如何。三为，为人是基本，最为关键。为政、为学都离不开为人，所以实际上也是为人问题。故三立，可以细分为三，也可合而为一。

对于司马迁的为人学，本书从三个方面言之：一是言他的为人性情，写他本人如何为人；二是他的游访要点，写他游访各地，实则主要着眼于为人特点；三是他书写为人，是以几个传记历史人物为人作为重点。

笔者长期研究《史记》，几十年来逐渐感到，《史记》是以传人为主，司马迁把历史人物写得形神兼备，紧抓人情，感人至深。他尤其重视为人

2 前言

之道，在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思想基础上，把为人与人为看成是个人荣辱、政治成败、风气好坏、社会安乱、国家兴亡的关键，是历史变化的根因。他写历史人物的为人处世，直接关系到三代盛衰、秦朝兴亡、楚汉成败、汉朝起落。故我们以为，他把历史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为的历史。他昭告人们，为人与人为，只要重天、亲民、正己、为了人民，就大有希望，就有益于世；就应该大书特书。他写舜、禹、周公、孔子、屈原、项羽、刘邦、贾谊等如此；写夏桀、商纣、秦皇、李斯、汉武帝、公孙弘等也如此；写刺客、游侠、卜者、佞幸等亦复如此。只是有正有反，有是有非，有善有恶，有褒有贬而已。

司马迁的为人学，提醒我们撰写和研究历史，不仅要注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还要留心于历史传统中的为人问题。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司马迁是全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他的为人学，是传统史学思想中的瑰宝。

施 丁于北京芳古园角室

2013 年清明节

目 录

上编 司马迁为人性情

第一章 君父之道	(3)
一 父谈崇道	(3)
二 “今上”信神	(9)
第二章 信侠从师	(22)
一 “耕牧河山之阳”	(22)
二 “吾视郭解”	(23)
三 “余闻董生曰”	(24)
四 “从孔安国问故”	(29)
第三章 “仕为郎中”	(31)
一 “仕为郎中”	(31)
二 “西至空桐”	(32)
三 “奉使西征”	(35)
四 “吾适北边”	(38)
第四章 李陵之祸	(42)
一 贰师封侯	(42)
二 杜周高升	(44)
三 李陵之祸	(47)
第五章 “有怨言”	(55)

2 目 录

一	《报任安书》	(55)
二	《报任安书》时间	(58)
第六章	“下狱死”	(64)
一	卫宏说的重要启示	(64)
二	《汉书》体例值得推敲	(67)
三	《史记》“今”字之特别意义	(69)
四	后人妄续也可佐证	(74)
五	如何而死是个谜	(76)
 中编 司马迁游访史迹人情		
第一章	“南游江淮”	(81)
一	大泽乡与陈胜起义	(81)
二	陈下楚汉大战	(91)
三	垓下之战	(97)
四	项羽自刎	(99)
第二章	游访东南	(104)
一	“想见其为人”	(104)
二	“窥九疑”、“探禹穴”	(109)
三	“观春申君故城”	(111)
四	“上姑苏”	(113)
五	“上会稽”	(116)
六	“望五湖”	(118)
七	“吾如淮阴”	(118)
八	经过下邳	(120)
第三章	“讲业齐鲁之都”	(124)
一	“吾适齐”	(124)
二	“适鲁”	(132)
三	“乡射邹峄”	(137)

第四章 游访梁楚	(140)
一 “厄困鄱、薛、彭城”	(140)
二 “吾尝过薛”	(145)
三 “吾适丰、沛”	(151)
四 “吾适故大梁之墟”	(158)

第五章 “过梁、楚以归”	(163)
一 经过荥阳、成皋	(163)
二 出入过两关	(171)
三 项、刘鸿门宴会	(178)

下 编 司马迁书写为人

第一章 正直与邪曲	(185)
一 表彰正直,讽刺邪曲	(185)
二 真诚可嘉,疑心可畏	(191)
三 妒忌陷害,社会病态	(196)
四 权贵骄横,裙带斜风	(201)
五 贪污成性,凶恶无情	(207)
六 醇谨处世,势利看人	(212)

第二章 有为与妄为	(216)
一 大禹为民治水	(216)
二 勾践用人失德	(218)
三 孔子著《春秋》	(219)
四 范雎激发	(229)
五 毛遂自荐	(236)
六 吕不韦图利	(238)
七 李斯患得患失	(242)
八 贵族骄奢荒淫	(245)
九 贵族争夺遗产	(247)
十 重钱财而轻人命	(249)
十一 孟子言“好利之弊”	(250)

第三章 士节与败类	(257)
一 激于义理	(257)
二 仗义助人	(260)
三 知恩图报	(266)
四 报仇雪恨	(275)
五 贤不肖论	(279)
第四章 交情与无情	(283)
一 顾全大局	(283)
二 知人输诚	(287)
三 不论贵贱	(288)
四 勇于担当	(293)
五 讽刺卖交	(294)
六 嗤势利交	(296)
后记	(302)

插图目次

书前插图

清版《史记》书影	(1)
陕西韩城太史庙	(2)
司马迁言修身为君子	(2)
《史记》“禹为人”	(3)
司马迁评孔子“至圣”	(3)
屈原行吟图	(4)
圯桥拾履	(4)
霸王别姬	(5)
田横五百士(部分)	(5)
法古今完人	(6)
《史记》董仲舒“为人廉直”	(6)
秦朝后期图(部分)	(7)
西汉后期图(部分)	(8)

正文插图

图1 升仙图	(19)
图2 司马迁评董仲舒、公孙弘为人	(25)
图3 汉西域诸国图	(43)
图4 “张楚”国号	(82)
图5 戏剧中的项羽形象	(98)
图6 虞姬像	(99)
图7 书法“想见其为人”	(107)
图8 韩信像	(119)

2 插图目次

图 9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	(120)
图 10	张良圯桥拾履图	(122)
图 11	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134)
图 12	峰山刻石	(138)
图 13	亭长画像石	(152)
图 14	萧何像	(155)
图 15	古函谷关故址	(175)
图 16	项羽入关路线图	(177)
图 17	《史记》汲黯为人	(190)
图 18	《史记》刘邦为人	(192)
图 19	《史记》公孙弘为人	(198)
图 20	《史记》张汤为人	(210)
图 21	大禹治水刻石	(217)
图 22	壘	(247)
图 23	《史记》郭解为人	(262)
图 24	公孙杵臼存孤	(265)
图 25	曹沫勃执齐桓公	(267)
图 26	专诸刺吴王僚	(268)
图 27	豫让刺赵襄子	(269)
图 28	聂政刺韩相侠累	(271)
图 29	荆轲易水辞别图	(273)
图 30	荆轲刺秦王	(274)
图 31	蔺相如奉璧于秦	(284)
图 32	《史记》信陵君为人	(289)



上编 司马迁为人性情

第一章 君父之道

一 父谈崇道

司马迁的家世源远流长。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追述，远的祖先较模糊难辨，近的则脉络清晰。

大约于公元前7世纪，司马氏到了少梁（古邑名。后来更名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市南芝川镇）。春秋以来，少梁属于秦国。秦惠王（前350—前311）时有个司马错。他在秦惠王庭前辩论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得失。张仪主张伐韩（战国七雄之一），以为可以从而威胁周王，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错则以为当先伐蜀，可以广地、强兵、富民。“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惠王以为司马错说得对，就采用其策，并派他率军去攻打蜀地，得胜，取蜀，当了蜀郡守，为秦打下牢固的根基。司马迁为其先人献策强秦而感到光彩。

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他在秦大将白起的部下，参加过秦赵长平之战（前262—前260），秦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使赵国损失惨重，丧失四十五万之众。后因白起被范雎谋害，含冤被赐死，司马靳也受到牵累，也同被赐死于杜邮（杜邮亭，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葬于华池（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西北）。人情如此，司马迁自然不无感想。

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他活动于秦始皇时代（前260—前210），为主铁官，即主管铁矿及冶铸铁器的官员，属于治粟内史，在国家经济领域有一定的地位。

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毋泽。他是汉朝初年的人，做过汉市长。市长是掌管市场的官员。汉代京城长安有四市，各设市长。

司马毋泽的儿子司马喜。他是司马迁的祖父。为五大夫，在秦汉二十等爵中，五大夫是第九级。他死后，与其父都葬在高门（即高门原，在

今陕西韩城市西南)。

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他的生年不明，死于元封元年（前110）。他是饱学之士，学天官（天文星象之学）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道家学说）于黄子。唐都，汉代天文学家，汉武帝时曾参与制定《太初历》。杨何，字叔元，汉代《易》学大儒。黄子，喜好黄老之术。由此可见，司马谈受学于名师，博学多闻。他“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即在公元前140年至前110年间做官，当了太史令，也称“太史公”。即在汉武帝前期做了犹如今之司局级官员。太史令属于太常（九卿之一，犹如今之部级），职掌天时星历。故司马迁曾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司马谈于政事不突出，而思想有异彩。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世，却推崇道家。他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名《论六家要旨》（以下简称《要旨》）。其论诸子思想有独到的见解，对司马迁有很大的影响，记录于《史记·太史公自序》。

（一）司马谈思想的内容

司马谈这篇名作，虽然不满一千个字，但是内容丰富。他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殊途同归，皆务为治。于是提出了各家的要旨，予以分析评论：阴阳家言吉凶襍祥，“未必然也”；但是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缛节，主劳臣逸，“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是言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俭朴，尊卑无别，使人“难遵”；但是言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尚法，亲疏不别，贵贱不分，“严而少恩”；但是言尊主卑臣，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专决于名，以致谬误失真；但是言控名责实，有所可取，“此不可不察也”。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以“定神”为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按照实际办事，“乃合大道”，“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不少学者在研究《要旨》时，说它是在“总结”各家思想，或称它是“诸子概说”，于是就在推敲：它总结的是先秦的六家，还是汉初的六家呢；它总结的符合事实，还是不符合事实呢；它总结的各家思想全面，还是不全面呢，如此等等。笔者认为，说《要旨》是总结各家思想或概说诸子，似乎提得高了些，不大切合实际，当然由此得出的评价也欠允

当。因为一说“总结”或“概说”，将它对照一下先秦诸子百家，总感到不全面，有欠缺，甚至有矛盾；对照汉初的思想，感到多了点什么，甚至无中生有，这样评价起来，就会出现高低不平，虚实不调的欠妥现象。

实际上，司马谈是担心各家学者惑于己见，疏于通达，所以他论的六家要旨，既不是六家的全面思想，也不一定是六家的主要思想；而是经过他主观选择的六家在“治”道方面的精神，同时也由他主观判断和摒弃各家的糟粕，正因如此，他批评儒家的重点“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先秦和秦汉之际的儒家身上很难找到，只有汉武之世的儒林人物方才具有；他所阐述的道家要旨，既不是先秦老庄，也不完全是汉初黄老，而是以黄老为主体，又吸收各家之长，加以熔铸而成的司马谈思想。具有这样思想内容的道家，在当时唯有司马谈。

（二）《论六家要旨》产生的年代

《要旨》丰富的内容，是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在评价它的历史价值时，首先要推定它产生的时代；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才能真正明确它的价值。那么，它产生于什么年代呢？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说法。有说《要旨》“可能出现在文景之际”，理由是，文景时期大大推行黄老政治，代表黄老思想的窦太后得势，所以司马谈写出尊崇道家的那些话来（张维华：《汉代初年黄老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有说《要旨》是同建元年间董仲舒对策和汉武帝统一思想针锋相对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45页），这似乎将它算作产生于建元年间；还有说“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故谈发此论欤？”（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第44页）这是猜测《要旨》可能产生于元朔五年。这三种看法，不无一定道理，但又不尽然。

我以为，《要旨》的出现，不是在文景之际，也不在武帝即位之初，而是产生在武帝独尊儒术和大兴功利之后，约在元朔、元狩之际。理由是：（1）虽然《要旨》尊崇道家，似乎应合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政治的要求，可是它尖锐地批评儒家的内容，肯定不是文景时期的产物，很难落实到文景时期的儒者身上。（2）《要旨》言各家殊途同归，皆务为治，意思是各家都有一定的长处，这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是针锋相对的。但是《要旨》批儒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并不像是针对董

仲舒的对策和汉武帝初年的行为。(3) 建元、元光之后,到了元朔、元狩年间,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付出了重大代价,民怨沸腾,统治者内部意见不一,《要旨》批儒崇道,很可能产生于这个时期。不过,猜测《要旨》产生于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的元朔五年,似也说的板了些。(4) 照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情况来看,他论《要旨》,不可能在入仕之前,也不大可能在入仕之初,一定是在入仕之后,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政治实践,才能形成起来;当然又不可能在儒道斗争一时沉寂而他本人已是暮年的元鼎年间。

(三)《论六家要旨》价值的重点

确定《要旨》产生于元朔、元狩年间,就可以肯定地说,它的价值,并不是“应合”文景时期“政治的要求”(参考前引张维华文),又不仅是“站在表章六经的反面”,“针对汉武帝思想统一的反抗精神”(参考前引侯外庐书),也不只是针对“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参考前引郑鹤声书);而有为学者们所忽视却又非常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同汉武帝大兴“功利”针锋相对。

汉武帝自建元、元光年间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了元朔、元狩年间,乘风推浪,继续发展,相继重用儒者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大动干戈,大刮民财。公孙弘其人,熟悉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善于看风使舵,阿顺君主意旨,积极支持汉武帝伐匈奴,兴儒学,鹜于功利,所以他平步青云,白衣三公,拜相封侯。张汤其人,擅长刑法,酷虐为吏,更是个跟着君主意旨转的阿顺苟合之徒,是汉武帝在征伐匈奴、官营盐铁等兴功兴利方面最得力的助手。最有趣的是,张汤办功利和刑法之事,能趋和汉武帝兴儒学的调子,“欲傅古义”,以儒术装点门面。汉武帝大兴功利,表面上节节取胜,实际上损失很大。《要旨》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等内容,以及“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等冷嘲热讽,正是针对形神骚动的汉武帝和公孙弘、张汤等辈的。

当时,同汉武帝和公孙弘、张汤等所作所为唱反调的,大有人在,最突出的是“学黄老之言”的汲黯。汲黯其人,做官办事,息事宁人,“好清静”,专在“无为”上下功夫,收到了“大治”的效果。《要旨》推崇道家“无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正是对汲黯为人为政的肯